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先秦社会与思想

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

[日]高木智见 著

何晓毅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日]高木智见 著 何晓毅 译

先秦社会与思想

试论中国文化的核
心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先秦社会与思想：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 / (日)高木智见著；何晓毅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5745 - 5

I . ①先… II . ①高… ②何… III .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时代 IV . ①B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0616 号

早期中国研究丛书

先秦社会与思想

—试论中国文化的核心

[日]高木智见 著

何 晓 毅 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pi.com.cn

(2) E-mail gupi@gup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7,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2,500

ISBN 978 - 7 - 5325 - 5745 - 5

B · 712 定价：36.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丛 书 序

“早期中国”是西方汉学(Sinology)研究长期形成的一个学术范畴,指汉代灭亡之前(公元 220 年)的中国研究,或是佛教传入之前的中国研究,此一时期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方法都自成体系。以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教授于 1975 年创办 Early China 杂志为标志,“早期中国”这个学术范畴基本确定。哥伦比亚大学近年设置的一个常年汉学讲座也以“早期中国”命名。

“早期中国”不仅是西方汉学研究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实用分类,而且是探求中国传统之源的重要的实质性概念。

从最初的聚落发展到广大地域内的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秦帝国建立,并且在汉代走上农业文明之路、建立起帝国社会的价值观体系、完善科层选拔官僚制度及其考核标准,早期中国经历了从文明起源到文化初步成型的成长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可以说,早期中国不仅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也孕育、塑造了此后长期延续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编户齐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稳定维系;商人的社会地位始终低下;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基本都被汉化,帝国疆域的扩张主要不是军事征服而是文化同化的结果;各种宗教基本不影响政治,世俗的伦理道德教化远胜超验的宗教情感;儒家思想主导的价

价值观体系以及由此造就并共同作用的强大的官僚制度成为传统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力量,等等。追溯这类基本性格形成伊始的历史选择形态(动因与轨迹),对于重新审视与厘清中华文明的发生发展历经,乃至重新建构现代中国的价值观体系,无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早期中国研究不仅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重心,长期以来,也是中国学术研究中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方面。早期中国研究在中西学术交流的大背景下,形成了独特的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这就是:扩充研究资料、丰富研究工具、创新研究技术,多学科协同不断探索新问题。

1916年,王国维以甲骨卜辞中所见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与《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的名称、世系一一对照,发现《殷本纪》所记殷代先公先王之名,绝大部分出现在卜辞中。王国维把这种用“纸上材料”和“地下新材料”互证的研究方法称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出土文献资料在现代的早期中国研究中显示出愈益重要的作用。殷墟甲骨100年来约出土15万片,其中考古发掘出土的刻辞甲骨有34 844片。青铜器铭文,1937年罗振玉编《三代吉金文存》,著录金文总数4 831件,其中绝大部分为传世器。《殷周金文集成》著录资料到1988年止,共著录了金文11 983件。此后到2000年,又有约1 350件铭文出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简帛文献资料如银雀山简、马王堆帛书、定州简、阜阳简、郭店简、上博简等都以包含大量古书而深受关注。

严格地说,王国维说的地下材料,殷墟甲骨、商周金文都还是

文字资料,这些发现当时还不是考古发掘的结果,研究也不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考古学提供的是另外一种证据。傅斯年提倡“重建”古史,他主张结合文献考证与文物考证,扩充研究“材料”、革新研究“工具”。1928年,傅斯年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并立刻开始发掘殷墟。傅斯年在申请发掘殷墟的报告中说:“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从1928年10月开始一直到1937年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共进行了15次发掘,发掘地点共11处,总面积46 000余平方米,这15次发掘收获巨大:在小屯北地发掘了53座宫殿基址。在宫殿基址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甲骨。在小屯村北约1公里处的武官村、侯家庄北地发现了商代王陵区,发掘了10座大墓及一千多座祭祀坑。在小屯村东南约1公里处的高楼庄后岗,发掘出了仰韶、龙山和殷三种文化层的叠压关系,解决了华北地区这三种古文化的相对年代。在后岗还发掘了殷代大墓。在殷墟其他地区,如大司空村等地还发掘了一批殷代墓葬。殷墟王陵的科学发掘举世震惊。中国考古学也从开创之初就确立了鲜明的为历史的特色和风格。为历史的中国考古学根植于这块土地上悠久传承的丰富文化和历史知识的积淀,强烈的活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始终支撑着中国考古学家的工作。近50年来,中国考古学取得了无比巨大的成就,无论是新石器时代城址还是商周墓葬的发掘,都是早期中国文明具体直观的展示。

不同来源的资料相互检核,不同属性的资料相互印证,提供我们关于早期中国更加确切更加丰富的信息,能够不断地解决旧问题提出新问题,又因为不断提出的新问题而探寻无限更多的资料,而使我们对早期中国的认识不断深入愈益全面。开放的多学科协同的综合研究使早期中国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对其他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来说,早期中国研究的这种研究风格和研究方法或

许也有其可资借鉴的意义。

王国维、傅斯年等人是近现代西方科学思想和知识的接受者传播者，他们的古史研究是现代化的科学研究，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学和中国学术的新时代。现代中国学术的进步始终是与西方学术界新观念、新技术、新方法的传播紧密相联的。西方早期中国研究中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重要的研究方法，比如文明起源研究、官僚制度研究、文本批评研究等等，启发带动着中国同行的研究。事实上，开放的现代学术研究也就是在不同文化知识背景学者的不断交流、对话中进步。我们举最近的一例。夏商周断代工程断代的一个重要基准点是确认周懿王元年为公元前 899 年，这是用现代天文学研究解释《竹书纪年》“天再旦于郑”天象资料的一项成果。这项成果的发明权归属韩国学者，在断代工程之前西方学界已确认了这个结论。将“天再旦”解释成日出前发生的一次日全食形成的现象的假说是中国学者刘朝阳在 1944 年提出的，他和随后的董作宾先生分别推算这是公元前 926 年 3 月 21 日或公元前 966 年 5 月 12 日的日食。1975 年韩国学者方善柱据此假说并参考 Oppolzer 的《日月食典》，首次论证“天再旦”记录的是公元前 899 年 4 月 21 日的日环食（《大陆杂志》51 卷第 1 期）。此后，1988 年美籍学者彭懿钧、邱锦程、周鸿翔不仅也认定“天再旦”所记是公元前 899 年的日环食，并对此次日食在“郑”（今陕西省华县， $\lambda = 109.8^\circ E$, $\varphi = 34.5^\circ N$ ）引起“天再旦”现象必须满足的天文条件，第一次做了详尽理论分析和计算，并假设食甚发生在日出之时，计算得出了表示地球自转变化的相应的 ΔT 为 (5.8 ± 0.15) h，将天再旦的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夏商周断代工程再次确认了“天再旦”这一成果，并为此于 1997 年 3 月 9 日在新疆北部布网实地观测验证。

本丛书不仅是介绍海外学者一些具体的早期中国研究的成

果,引进一些新的概念、技术、思想、方法,而且更希望搭建一个开放性的不断探索前沿课题的学术交流对话的平台。这就算是我们寄望于《早期中国研究》丛书的又一个意义。

只有孤寂的求真之路才通往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境。值此焦躁不安的文化等待时刻,愿《早期中国研究》丛书能够坚定地走出自己的路。我们欢迎所有建立在丰富材料缜密分析基础上、富有独立思考探索成果的早期中国研究著作。

著述和出版是长久的事业,我们只要求自己尽力做得更好一些。希望大家来襄助。

朱渊清

2006/12/2

写于学无知室

中文版序

我所理解的历史研究，是按如下顺序深化的：首先抱着某种模糊的问题意识面对史料，在对史料的读解过程中，本来模糊的问题意识逐渐具体化，演变成某个特定的研究课题。下一个阶段，按这个课题再查阅史料，寻找与课题有关的记载。在此基础上，对照相关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和研究，经过三思三省，最后得出一定的结论。通过这样的方法，在研究几个课题的过程中，如果能发现某种贯穿几个课题，与时代的本质有关的什么（更大的课题），则聚焦其中，集中考察研究。同时再考察其前后时代的特征，由此则可更加深入接近该时代。

我是以《左传》为研究对象的。我在上述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祖先观念牢固存在这个问题，最后达到的结论是用此概念可以规定春秋以前中国社会的历史特征。在这个结论的基础上，我努力想描绘出一个鲜明的春秋以前社会和战国以后社会应有的状态，并试图进一步在此历史状况下读解《老子》思想。这个研究的结果，就是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本书。

我恩师的恩师宇都宫清吉先生一贯主张，与每个人都有自己独有的人格一样，一个时代也有它特有的人格，先生称其为“时代格”，先生把追求这个时代格作为自己搞历史研究的目的并终生付诸实

践。我自己与宇都宫先生的这个观点完全共鸣，我也试图用同样的态度进行研究。在研究的时候，我尽可能着眼于构成社会最基本的东西，亦即不是社会关系互相对立的一面，而是亲和的一面，尽最大可能抓住时代的特征，而且尽可能把自己投入到历史的世界中去，以当时人的视线看当时的世界，并以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实际感受为核心，努力做到内在性的、共感性的理解该时代。但是我的这种主观意图具体发挥程度到底如何，现在只能期待读者诸君判断了。

话虽如此，值此中文版出版之际，我的内心还是充满了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一方面我非常担心自己的这本书是否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认可，另一方面我又衷心希望能够得到中国读者的认可。几年前，在接到畏友朱渊清先生翻译出版本书中文版稿约时，我对于把本书这种水平还不够高的著作在中国出版，持很消极的态度。但是，后来改变我的这种想法，促使我决定翻译出版的，是我想起大约三十年前我从中国留学归国后，暂时未能发表论文时杨宽先生对我说的话。杨宽先生的教诲，激励了我求教于大方的决心。

杨先生那时对我说，发表论文和著作，不仅仅是把自己的学问公之于众，更重要的是求教于学界或读书界，是接受方家批评指教的绝好机会。要多发表，多接受批评，把批评变成自己成长的食粮。因此，我衷心希望广大中国专家学者和历史爱好者以及一般读者能对我接受朱先生的好意，听从杨先生的教诲出版的本书提出批评指正。

最后，我对山口大学何晓毅教授不厌其烦拨冗翻译本书表示衷心感谢；同时对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审阅中文译稿的东亚大学客座教授黄晓芬先生表示衷心感谢。

是为序。

高木智见

2010年12月12日

目 录

中文版序	001
导 言 本书的目的与立场	001
第一节 先秦是个怎样的时代?	008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	008
第二节 关于史料	016
第一部 血族社会的世界观	
绪 论	027
第一章 古代人与头发	030
第一节 头发与刑罚·兵士俑的发型	032
第二节 头发的作用	036
第三节 头发的意义	040
第四节 原中国时期头发的含义	053
小 结	056
第二章 人与植物的类比认识	058
第一节 土毛·不毛	058
第二节 文王孙子,本支百世	060
第三节 《诗经》与类比认识	064
小 结	068

070	第三章 永存的血族
071	第一节 “世”字
075	第二节 生命的连锁继承
086	第三节 舜的子孙
089	第四节 血缘的长期存续与祭祀
103	第五节 世系·世本
107	第六节 世的意识
111	第七节 不死鸟的陈国
119	第八节 延续祭祀的理由
128	小 结
130	结 语 走向战国时代

第二部 《老子》思想的历史研究

143	绪 论
148	第一章 《老子》思想的本质及其背景
148	第一节 《老子》思想的本质
159	第二节 再读“郑伯克段于鄢”
163	第三节 普遍存在的《老子》处世思想
169	第四节 范氏一族的处世
179	第五节 统治阶层的决策过程
190	小 结

第二章 历史与《老子》	191
第一节 什么是历史?	191
第二节 外族历史的教训	203
第三节 以史为鉴·应尊之善	208
第四节 “敬”的处世	216
第五节 “敬”与《老子》	226
第六节 “敬”的具体化	230
第七节 历史事实的抽象化与《老子》思想	236
第八节 普遍存在的《老子》思想	240
小 结	249
第三章 天道与道	251
第一节 何为史官?	251
第二节 道与《老子》	261
第三节 史官的直笔	270
第四节 从巫师到史官——夏启及其子孙	279
小 结	306
结语	308
后记	319
索引一 近现代研究者姓名索引	322
索引二 出土资料、文物、遗迹索引	325
索引三 关键词索引	327
索引四 《老子》重要语句索引	331
译后记	334

导言

本书的目的与立场

首先，我想界定本书所涉及的范围和对象，并说明本研究的意义。

先秦，指的就是秦朝以前的时代，往前可以无限追溯。本书在必要时将会言及新石器时代后期的龙山文化时期，但是基本范围为夏代到战国时代，绝对年代为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到公元前两百年前后的近两千年间。

其次，关于“社会与思想”，正如字面的意思，指的就是该时代的社会状况以及基于该社会的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不是指诸如诸子百家的言说等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而是指产生了这些思想家和思想的时代，以及社会的、日常的、更基本的思维方式以及人们的心像。或者说就上述近两千年间的古代中国的社会形态，以及在该社会中生活并死去的人们的生活感觉，又或者可以说是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对此我拟提出我自己的见解。我认为要研究诸子百家的思想，只有在明确了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才能进行。

另外，研究诸如此类的“先秦社会与思想”，在理解中国文化问题上具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个问题不外乎就是先秦这个时代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而已。下面让我们一起看一下

苏秉琦、梁启超、柳诒徵、杨宽等 20 世纪中国有代表性的学者们的先秦时代观吧。

以广为人知的所谓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结构说而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在其专著《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①中，把中国历史进行了如下概括：中国文化根源于一百多万年前的旧石器文化，而中国文明则始动于定居农耕后原始村落开始形成的公元前七千年前后。

而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在地域文化发展的基础上，中国各地陆续诞生了比之前的氏族部落更安定、更独立的高度政治势力，即早期的城郭都市国家“古国”。此后的一千年间，也就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期，是传说中的万邦林立的尧舜时代，亦中原汉族同周边的蛮、夷、戎、狄互相影响与并存的时代。

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出现了由若干个“古国”集合而成，称霸一方（某一特定地区）的“方国”。在夏、殷、周三代，众多“方国”相互共存并各自成熟、发展，它们在一个“王朝”下构成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形式的中国，或者说天下。其后，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动，这些“方国”被“郡”所包摄，形成统一了诸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秦、汉帝国。此后，这个体制一直延续至清代。

诸如这样的公元前三千年到现在的中国五千年史，若用苏秉琦古国、方国、帝国三阶段论的观点来看，先秦时期可以理解成古国与方国的时期，也就是中华帝国的萌芽期，或者说准备期。

20 世纪初叶，梁启超在其《中国史叙论》第八节《时代区分》中，运用自己有关古典文献的渊博知识和基于对自身，以及自身所生存世界的“炽热的眼光”的观察，把中国史分为上世史、中世史、

^① 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 年。

近世史，并作了如下概括：作为上世史的先秦时期，是中国民族独自发达、竞争、团结的时期，可以定义为“中国的中国”。这个时期的特征是，征服了土著民族的有实力者及其功臣和子孙分头割据重要地点，也就是封建体制得到了确立。

随后的中世史，从秦始皇统一到乾隆皇帝治世的大约两千年间，是“亚洲的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诸民族进行频繁交流和激烈争斗的时代，这个时期可以界定为中央集权体制的完成期和君主专制体制的全盛期。

而近世史可以界定为从乾隆末期到今天（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世界的中国”，亦即中国民族与全亚洲诸民族齐心合力，与西欧列强进行交涉和竞争的时代。因君主专制体制崩溃和立宪政治体制确立而产生的内部和外部的诸多变化，都是过去两千年间从未经验过的，我想有必要将其划分为别的时代。

从梁启超的这些观点来看，先秦时代即为中国独自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世界的时代。

近年，随着如何实现中国文明与西洋文明的有机融合与统一这个课题的显在化，重新评价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历史学家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①中，也把中国史分成了三个部分，并作了如下描述：太古到汉代为“上古”，这是中国民族基于自己的创造力，从部族阶段出发形成了国家，创造出了独自文化的时期；后汉到明末为“中世”，这是印度文化传入中国，同中国固有文化冲突和融合的时期；明末到民国初年为“近世”，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双方渐行衰退，同新传入的西洋学术思想、宗教、法律、制度产生冲突并开始融合的时期。

柳氏的观点与梁氏近似，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独自文化的形

^①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正中书局，1948年。

成期。

以上三硕学的先秦时代观，即中华帝国准备期、中国的中国、或者独自文化形成期，虽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但在认为先秦时代是中国文化原基形态形成期这点上却是基本一致的。对此，特别着眼于战国时代，并进行了明确论述的是杨宽的《战国史》^①。

杨宽详细阐述了恩师吕思勉的学说。他认为，战国时代是中华帝国的形成期，秦汉以后的两千年，历代王朝从根本上只不过是继承了战国时代形成的各种结构而已。也就是说，政治、经济上的各种重要制度，皆是在蹈袭战国时代诸制度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而已。同样，历代的学术和文化也可以理解为是对战国时代学术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战国时代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直波及至今。

根据以上诸先辈的见解，本书为了明确界定先秦时代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进行以下时代划分：夏、殷、周三代为“原中国”；秦到清为“传统中国”；民国以后为“现代中国”。但是在原中国和传统中国之间有春秋战国时代这个过渡期。而且一般笼统称为春秋战国的这个时代，正如后述（本书第131页），古有汉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明末清初有顾炎武的“周末风俗”条（《日知录》卷十三），现代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②所强调的，实际上春秋时代与战国时代有很大的不同。因此作为过渡期的春秋战国时代，可以严密划分如下：春秋时代浓郁地残存有其以前时代的特征，因此应该看作是原中国的完成期或终末期；而战国时

^① 杨宽《战国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②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